

年代后期干部登记数据等等。

文书资料：

- 1, 基层政府文书资料。约 10 万件。
- 2, 企事业单位文书资料。约 9 万件。
- 3, 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文书资料, 约 1 万件。
- 4, 会议记录。

我们搜集了数十种连续性的会议记录, 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会议记录、生产大队的会议记录、造反派组织的会议记录、工会会议记录等等。

个人与家庭资料：

- 1, 个人书信。31 多万封。
- 2, 个人日记与工作笔记。3200 多本。

## 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与山西社会研究

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实践中应该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 这对治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资料的发掘利用都提出了挑战, 大力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需要一场“资料革命”。

### 一、从“单兵作战”到“集体调查”：档案的搜集

1、最初对资料的搜集以“单兵作战”为主, 即多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员从家乡着手, 在熟悉的环境和有力的人脉资源基础上展开调查和收集整理。

2、在个体调查之外又展开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团队搜集。由以村庄为单位, 扩展到以县市区域, 从而进行全面的“地毯式”搜集。

3、农村档案兼具复杂性与多样式, 是一个庞杂的“资料群”, 采集的分布点已经从南到北遍布了整个山西省。在内容上除村庄和乡镇外, 还包括与工厂、水利、林场等相关的资料。

### 二、呈现丰富原貌：档案的整理与出版

1、从上千万件档案中选择了 20 个村庄, 选择的标准是：在时间上完整连贯, 内容上丰富系统。

2、资料整理依序而行：首先以村落为单位对档案进行分类, 其次开展目录编排工作, 建成电子文档, 同时对每份档案进行编码；第三装柜, 按照已经整理而成的目录, 以档案袋为单位, 装入档案柜中, 编号保存。

3、我们选定 20 个村庄共约 100 册的完整资料文本进行汇集、出版。关于档案资料的电子化、数据化方面的工作也在不断尝试。

### 三、草根何以发声：文本里的基层社会

1、从依托对象或反映的内容来看, 村庄档案资料的内容以村庄和村民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为主, 以灌区、供销合作社等为依托单位的档案资料的内容具有专题性的特点。

2、大多数村庄都保留有阶级成分登记表、完整的帐册资料以及上级文件, 但也各有特点, 有的个人档案丰富, 有的包含村庄活动的内容较多, 有的成册上级档案连续完整, 有的账册系统, 有的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的分类统计较为详细。

3、大致可分为八大类：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包括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



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

#### 四、回望集体化：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1、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考。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种核心的问题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

2、中心相关研究，综合运用官方文件、公告与农村基层文书、账册，既考虑到了政治史发展的宏观脉络，又充分关注微观的乡村场景，以村庄、公社、县域或独立的河流和水利体系为研究单位，涉及到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妇女解放、医疗卫生、日常生活等方面。

## 第二部评论

内山雅生（东洋文库·宇都宫大学）、祁建民（长崎县立大学）

第二分组会的主题是民众、集体和国家，主要讨论民众与国家的问题。刚才两位老师分别讲述了民间书信和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整理情况，特别提到了其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下大力量收集民间资料，还进行相关田野调查，对于书信作者或产生资料的村落进行实地调查，与文字资料相印证，这些都是从国家和政府的档案文献中很少能看到和了解到的，所以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和精彩。地方和民间文献与国家行政当局的档案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值得重视。特别是在以民间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史研究中，解读这些文献时应与已经被卷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民间以及政治问题保持有一定距离。

我们认为对于民间或地方文献，在使用这些文献时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从这些民间和地方文献中如何理解个人、局部与国家 and 整体的相互关系问题，避免研究的“碎片化”。要将个人与社会，村落与国家联系起来考虑。并且要由此发现以往研究的不足。这方面，日本学界利用村落文献，已经有很好的研究。

日本的近世史研究中有被称作“地方文书”的文献。主要是对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封建体制时期形成的有关农村旧文书的总称。比如神奈川县，1868年时有945个町村，有关旧文书截至到1972年共存有25万件。东京大学牧原成征老师在《近世的土地制度与在地社会》一书中利用近江地区文书，对于一个叫东野的“小领主”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土地账簿的分析，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就土地问题，特别是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时代土地所有情况的变化进行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从明治到昭和时期的农村社会文献也极其重要。比如曾任金泽大学教授的林宥一老师，充分使用长野县五加村的史料，深入探讨了昭和恐慌时期的租佃争议情况，从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农民运动的社会历史构造。通过他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近代日本一个地方行政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在近代是如何变化的，又是如何陷入危机而再加重建的。他的研究论文收录在大石嘉一郎、西田美昭主编的《近代日本的行政村》一书中。五加村史料不仅是描述日本农村社会末端的基础史料，同时还是解决理论性问题的实证性资料。山西大学的农村基层档案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农村的“地方文书”，由此可以从村落角度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

其次就是民间和地方文献的可信度问题，由于这些文献产生于非官方或上级国家机构，文献的内容虽然生动具体并且十分丰富，但是也有随意性和不规范的问题，不能由于是来自于民间或地方，就认为这些文献就完全真实可靠，应加以甄别和分析。

比如民间书信，本来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信息和情感交流，具有隐私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时期，公民个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一些特定人群的通信权利则受到限制，这样，他们在书写信件时就有可能考虑到这封信可能会被别人看到，因而不敢把真实的想法全写出来。中国1954年宪法第90条规定了“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但是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只规定了通信自由，而没有提到通信秘密受保护的问题。通信自由只是说通信不受干扰，让你写信，与通信秘密受保护的内涵不同。在1982年宪法第40条中才规定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后来的刑法第252条才规定了“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